

首页 → 专题频道 → 口头传统研究 → 学术源流

《口头史诗诗学：历史与方法》（中译本前言）

发布日期：2005-01-20 作者：[美]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 译者：朝戈金

【打印文章】

背景

显而易见，口头理论的广为流播——针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与植根于口头传统的文本两方面而言——可以通过若干重要的视点进行追溯。早在1925年，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这位古希腊文学专家，就注意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规模浩大的叙述远非是某一个人所能创造的。在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里，帕里辨别彰明地指出这些体制宏长的诗篇——总计约达28000诗行——当肯定为希腊人集体的遗产。他认为与其说是单子独一的吟游诗人，而毋宁说是有着若干世纪之久的故事讲述传统，穷启了这些英雄故事（史诗）的渊源。

在此初创阶段，口头理论还完全地依傍于文本的分析。帕里通过考察荷马史诗中重复地、循环地出现的诗行与场景——例如“飞毛腿阿卡琉斯”或“灰眼睛的雅典娜女神”的多次使用，抑或是用于描写宴饮、集会或哀悼等叙述范型（narrative patterns）的许多例证——伸张其矍然以解的论思。一个不会书写的诗人，帕里阐扬道，在口头表演中是必定会采用“常备的片语”（stock phrases）和“习用的场景”（conventional scenes）来遣词创述他的诗作。既然当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理当如此的书写技术，表演者就需要一种预制的诗歌语言（prefabricated poetic language）的秉持，以支撑在表演中进行创编的压力，方能在即兴演唱中成功地架构长篇叙事诗歌。荷马史诗中周期性（循环）使用的语言便由此被理解为口头诗人的工具箱，他——以及他之前的许多代诗人——藉此以面对口头诗歌创编的挑战。那些被称做aoidoi的古希腊歌手，代代相承，就是凭藉着学习和使用这种特殊化的语言而使他们的史诗传统得以传祚和流布的。

然而，文本分析本身并不足以验证在古代荷马文本背后有一个口头的诗歌传统。鉴彻于此，帕里和他的合作者艾伯特·洛德，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旅程。在三十年代中期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他们得以亲历了一个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在1933年到1935年间，他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南斯拉夫省份的六个地区，通过使用特别制做的声学录音装置，从guslari（歌手）那里录制了数百首史诗的演唱；许多演唱还由他们的当地助手尼考拉·武依诺维奇依据口述作了文字记录。在随后的考察（检验）中他们发现，这些演唱表明它们可以与荷马史诗进行一种切近类比——在颇具传统特征的周期性片语和典型场景上，也在大量的叙事范式中。简而言之，古希腊的和南斯拉夫的诗歌语言都以相同的方式被特殊化了：他们都是由“大词”（“large words”）构成的，此即易于变通使用的修辞单元与叙事单元，以帮助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进行创编。既然这些前南斯拉夫的诗歌毫无疑问地是口头传统的产物，帕里和洛德便由此推论出荷马史诗也一定衍成于相同类型的本源。文本分析的结论就这样通过田野作业得到了确证。

正如在《口传文学创作论的历史与方法：帕里—洛德学说》的第一章中所表明的那样，帕里和洛德当然没有创辟口头理论的一切方面。某些前提早是古已有之，继而，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的学者们，特别是德国和斯拉夫语属的学者们，在对该理论得以成型的知识（智思性）背景上，也有卓著的贡献。但下面的说法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言之有据的），即：对于将各种观念或思想——它们出自文学、人类学、语言学 and 民俗学——融铸为一个独特的集大成而言，并且对于开创出一种综合一体的、极具创造力的研究方法而言，则完全归功于帕里和洛德。他们的伟大功绩正是在于将那些零落的散见集结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正是在于将一系列显然缺乏联系 的观察资料具体地明晰为一种专门的、连贯一致的阐释。

这一阐释的威力，可以通过口头理论在1960年——洛德的比较研究的宣言《故事的歌手》就出版于是年——以后的延展播布而得到生动形象的说明。此后，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囿于古希腊文学和前南斯拉夫的史诗。考察研究的视界很快就扩展到了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澳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众多传统的论述中。不止于此，这一学说的领域还进一步拓宽为对古典作品的涵盖，例如《诗经》，并使之与现代诸传统——例如扬州的说唱——并列而举。所有不同的样式也都被纳入了学者们审慎详察的视野之中，以期寻绎出对口头传统的理解：除了史诗，还有抒情诗、民谣、颂诗、历史性韵文，以及难以计数的其它样式，在世界范围内，均已成为一种空前增长的专门性参考书目中的研究主题。今天我们可以信服地说，口头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六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

的传统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一学说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理解所有这些传统的方式。通过帮助那些沉浸在书写和文本中的学者们，使他们通观在一个宽阔的民族和文化的型谱中去洞识和欣赏非书面样式的结构、动力和艺术，口头理论已经为我们激活了去重新发现那最纵深的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这一理论为开启口头传统中长期隐藏的秘密，提供了至为关键的一把钥匙。

近期的发展

自从《口传文学创作论的历史与方法：帕里—洛德学说》在1988年首次出版以来，该领域已经在三个重要的方向上获得了发展，而每一方向都是口头理论在其基本原则下的合乎逻辑的深拓。第一，跨越不同传统进行比较和对照的双重强调，一直秉承着敏瞻睿智的判断，并颇受推崇地保持着日益增长的势头。这意味着，始于初创阶段、且连续发展下来的、在不同的传统中对共同性（类似性）问题的关注，由于转向更加深细地考辨其间的差异性问题的，比较与对照便出现了两相并行的均势。（?! No longer应为否定，it句在此应为show... that的先行引导句），例如，要说明荷马史诗和南斯拉夫史诗二者都相交使用重复出现的片语，不再是过于简单的归结；现在，我们能够将那种共有的策略(shared strategy)设定为每一传统背景——各自语言上的特性——的返动。仅仅指出下述问题也是不充分的，即非洲史诗与马里史诗不同，或是法国叙事诗与中世纪时期诗歌不同，它们均使用传承性的、常备的场景作为它们的特殊化的诗歌语言；现在，我们可以考察那些预制的、易于变通的结构之特征，在各自的传统中是怎样带着某些差异而趋于成形的。比较和对照的研究趋势正在勃兴，有关的阐述及其详实的例证，可参见我的另一部专著《传统口头史诗：〈奥德赛〉〈贝奥武甫〉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归来歌〉》（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1993再版）。

第二个发展方向，是离开口头理论曾独尊其是的结构性范本，而更多地强调并转向对口头传统艺术的理解。这一动向从六十年代起就已露出端绪：当时一些来自其它领域的学者担心，对语言技巧和叙事方式的过度强调，已经将我们洞察艺术问题的视线弄得模糊不清。如果口头传统仅由对诸多结构的操作来构成，他们诘问道，那我们怎样将其解释为口头的艺术(verbal art)？

口头理论则在口头传统的习惯用语的考察研究中另辟蹊径，从而对这一挑战作出了回应。也就是说，调查者开始去考寻的不仅是那些修辞性“大词”的字面含义和场景结构，同时也关注到了这些范式所暗含的内在蕴涵。下述这类单元的传统含义，作为索证的根据开始积聚起来，例如：“飞毛腿阿卡琉斯”就不止是便利性的标签，而且还是特殊的暗示（提示），以唤应（唤集起）阿卡琉斯的整体特征；“宴饮场景”也不仅仅只是一种常见的创编策略，还是一个可被认知的社会交往的符号，同时也是未来和平的一种预兆（示）；“英雄归来”范式也不单是一种叙述类型，而是一种具有完整功能的故事形式(story-form)，它将某些确定的期望进行必要的编码，诸如一位妻子对其英雄的等待，求婚者对她和她丈夫的领地的威胁，英雄为捍卫家园所进行的战斗，以及一系列引领着夫妻得以重聚的线索等等。每一个结构都表明它们不仅仅只是结构；每一个结构同时还是一幅“映射图像”，通过运用这些熟悉的提示，帮助听众或读者去穿越他们所不熟悉的叙事领地。口头传统的艺术寓形于其自身的复合特质中，包括反复出现的独特事件，以及用以叙述这些事件的惯用技巧。口头传统的艺术既不是书本上的，也不局限于单一的文本，而是生死攸关地依托于总是（一直）被隐含在任一单独表演之中的传统。当前的研究表明，除去被叙述出来的文本之外，处于受动的听众成员或读者也当能意识（联想）到那些未及叙述的部分——但是，尽管如此，惯用语句的使用依然表达着暗指涵义。沿该方向对传统性语境进行研究的相关描述，可以参见我的著作《永恒的艺术：从结构到意义的传统口头史诗》（布鲁明顿，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91）。

请继续浏览：[1](#) [2](#)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http://www.iel.org.cn>)”。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جو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